

何其芳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何其芳选集

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成都

扉页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陈世五

《何其芳选集》（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875 插页7 字数242千	
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000册	

书号：10118·183	定价：1.02 元
--------------	-----------



一九四八年在河北省平山县

编 选 说 明

何其芳同志（1912—1977）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部选集，收入了何其芳同志的诗歌、散文、论文等著作，分一、二、三卷同时出版。其中书信、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译诗以及其它一些诗文，是第一次同读者见面。

这部选集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茅盾、巴金、沙汀、艾芜、蔡仪、卞之琳、马识途、王季思、方敬、雁翼、王觉等同志以及何其芳同志的夫人牟决鸣同志的热情支持。尹在勤同志担负了具体的编选和注释工作。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在编选工作中可能还存在不少的缺点甚至错误，请同志们指正；何其芳同志的书信，我们也征集得很不全面，亦望有关同志继续提供，以便再版时补进。

1979年3月1日

题 记

沙 汀

其芳同志逝世以后，我就不时渴想倾吐一下悼念之情。一些熟人，也认为我应该写。他们知道我同其芳有相当久的关系，而且是非同寻常的关系：我们是三十年代末一道去延安的，一道在“鲁艺”教书，一道随同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

但是，由于时间太久，自己的记忆力又日益衰退，总担心写不准确，写不好。有时候，一些回忆片段纷至沓来，又不知从哪里写起，因而老是动不了笔。现在，其芳的选集要出版了，出版单位希望我写点题记之类的东西，我感到无可推诿，也不能拖延了，我得借此了却一桩心事，减轻一点思想负担。

其芳和我都是三十年代初发表作品的。但是，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我们才得相识。抗战开始后，我们于一九三七年分别由上海和华北回到四川，三八年同在成都作中学教员。由于组织上的安排，教课之余，我和其他同志在当地文艺界作些联络工作。就这样，我和其芳也相识了。最初两三次见

面，他给我的印象比较一般：长袍、眼镜、身材不高，油黑的脸显得胖胖的，书生气质相当重。

开始引起我注意的，是其芳在他和卞之琳等同志合编的那份小型刊物《工作》上连续发表的散文《论工作》和长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因为如果说他的《还乡杂记》已经表明他从“刻意”“画梦”开始面向现实，那么，经过“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新的革命形势的震撼，上述两篇作品表明，他对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是积极拥护的。因而这年将近暑假，他在听到我将去延安的消息时跑来找我，也就很自然了。

这是他第一次到我家里，同他一道的还有卞之琳。其芳这次给我的印象跟以往不同，开朗多了。爽直热情，没有丝毫客套、拘泥的痕迹。他们共同提出来的要求是，希望能同我一路到延安去，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那时候，到延安去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因为到了广元以后，沿途都会遭到盘查、留难，甚至有被抓、失踪的危险。我答应立刻向组织反映，而不久我们就一道出发了。

我们是凭着去二战区川军李家钰部队工作的一张护照，从成都动身的。可以说，这次旅行的开始，也是我进一步认识其芳的开始。到了梓潼，我才发觉他对旧社会了解得比较少，一些商人在栈房里玩弄女性的丑恶行为竟然使得他那样大惊小怪；而在宁强遭到盘查的时候，因为那些“丘八”怀疑我们是到延安住“抗大”的，万没料到他会用一种玩世不恭

的态度和语调，摸一摸下巴说：“都长胡子了还去读书?!”幸而我们带得有那张护照，倒还没有引起更多麻烦。

我们本来都想很快就到前线去的。到了延安不久，由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缺教员，学院负责同志邀我和其芳留下教书。我呢，推脱不得，想不到其芳也爽快地承允了。而他对人的诚恳、爽直，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很快在“鲁艺”赢得了同志们普遍的赞扬，因而不久就由院部的党组织接受他入了党。大约就是这段时间，他写了他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这篇文章曾经传诵一时，受到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国统区知识界的重视，因为作者在当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响亮地喊出了一代进步青年的心声。我们不妨说这是其芳政治思想上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飞跃。

毛主席曾经赏识过其芳同志的工作作风，说他做事认真。而据我所知，他那种事无巨细都不肯马虎的精神，真也值得学习。比如说，文学系的同学要办墙报，他就积极支持，为他们看稿、改稿，设计版式。有时嫌他们抄写得不象样，他还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至于对他们的习作，哪怕一首十来行的小诗，他也会写上几百字、千把字的评语。有关其芳这一类事迹，曾经在“鲁艺”工作、学习过的同志一定比我知道得多。

我记起我们一道参加秋收的经过来了。组织上分配给我们劳动的地点是二十里铺。下去之前，我们就动员准备随同我们下去的同学，作为写作实习，每个人这次劳动回来都得写

篇文章，其内容则是描写自己在劳动中熟识的革命根据地的新型农民。对于如何选择、观察自己的写作对象，我们曾经作过多次讨论，而其芳更把它们逐条写成文字，刻印出来给大家。等到各自住定下来，我们每天晚饭后又分头到他们所在的农民家里进行一次检查，给以必要指导。

在这一段时间里，其芳给我的印象，进一步改观了。他已不复是一个文人学士，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社会活动家。走路来，只见他足板翻！情绪非常愉快，尽管有时碰见麻烦事儿，他会一头撞来，苦着脸呻唤道：“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啊！”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他的愉快情绪。有时候，就连较为合格的诉苦，也会往往叫你感到，他之诉苦，只因为他太愉快了，需要换换口味。而且，并非偶然，长时期来他仿佛都是这样。

当然，这不是说他只有愉快，没有别种感情。他也有苦恼的。初到冀中那段时间，由于不断的战斗和夜行军，又没有固定工作，我们就都感到过苦恼。而为了排遣，一有空他就埋头抄写他抗战前所作诗歌。字迹又小又极工整。这个手抄本我曾经一一拜读，尽管它们的内容同当时的环境很不相称，但我多么欣赏其中那篇《风沙日》啊！当然，这种情绪很快也就被克服了，因为当部队结束了大曹庄的战斗，转移到留班寨的时候，他就主动去师政治部参加了编辑工作。

从无数事实看来，其芳是从不轻易让时间溜掉的，总想有所作为。而直到病势垂危他都念念不忘工作！一九七七年冬，

我跟高缨同志去看其芳的家属。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到北京，没料到决鸣同志去了南方，孩子们也不在家，门锁住了。我们在文学研究所一位同志家里呆了下来，等候他儿子辛卯。这位同志告诉我们，他在医院看护过其芳，说是动了手术，清醒过来以后，其芳的第一句话是：“清样送来没有啊！我还要看……”

诚恳直率，平易近人，这是人们对其芳同志的共同看法。但是，只要同他相识较久，在另外一点上看法却也相当一致：在是非面前，或者听到什么人胡说八道，他会立刻激动起来，直言无隐。有时还会弄得对方下不了台。在“鲁艺”一次纪念一位世界名人的座谈会上，因为一位同志的发言不大象样，他恼怒了，于是一条一条进行批评。而且，照例用他那感情激动时迅猛、高昂的语言洪流淹没了对方，以致举座为之失色。

事后，有的同志专门找他谈心，承认他的意见不错，但却对他的态度、措词进行了批评，认为那样对待一位长期侨居国外的同志，而且在大庭广众中，就不大恰当了。对于其芳，企图一次谈话就说服他，也不容易。但是，自从那次谈话以后，他的态度是逐渐改变了。当然，碰到意见分歧，却也照旧敢于直言，把问题摆出来进行论争。而这正是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具备的品质：光明磊落，从不唯唯诺诺，口是心非。

而且，其芳同志不仅敢于正确进行批评，并虚心接受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经受得住尖锐、乃至过火的批评，不会

因为碰见这样的批评就气馁了，背上思想包袱。一九六〇年初，他就遭受到过这样的批评。当时我早回四川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反应相当强烈。而在中宣部接着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却照旧侃侃而谈，无所顾忌。在举行座谈会期间，周总理曾经接见过一批来自外地的同志，我把自己对其芳的观感谈了，周总理微笑道：“何其芳是一个好同志。”

一位具有这样革命品质的同志，能够在原则问题上不会对任何以“权威”自命的角色让步，更是非常自然。这里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有人凭借“四人帮”的淫威，采用遗尸诈害、要功诿过的恶劣作法，不止一次在《红楼梦》问题上对其芳同志进行诬陷、打击的时候，即使早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而且随时都会遭到“揪斗”，他也从不屈服，每次对熟人谈起，总要义正辞严地驳斥一通！

一九七六年他到成都，我们曾经见过两次，这中间他提到过这事没有，我记不清楚了。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身经百余斗，现在还有什么怕的！？”说时浮上一种颇为自豪的微笑。尽管我们将近十年不见面了，经常都想念他，但我没有询问过我们分手后他的遭遇，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他的传闻，这不是因为当时“四人帮”尚在继续肆虐，我自己还不怎么自由，他的健康情况叫人不能不回避开这些问题。

现在想来，在两次会见中，尽管没有发现过他意识中断的病象，且还照旧有点口若悬河，但当第一眼瞧见他时，我

可就忍不住在心里惊叫道：“怎么显得这样老啦！”他小我七岁啊！因为他身肥体胖，步态蹒跚，是由辛卯和他一个小外甥扶着他走进院子里来的。闲谈中间，他曾雄心勃勃地大谈他的长篇小说计划。而他回四川的主要目的，正是为创作这个长篇增补资料。这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谈到他这个计划。但我破例没有向他说扫兴话：“还是用其所长，写成散文吧！……”

听说，大约是澳大利亚吧，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正在对其芳的思想转变问题进行探讨。我以为这个选题不错，一个因为对现实不满而逃避现实的青年诗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会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而且一经入党，不管生活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尖锐复杂，也不管是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一直积极工作，数十年如一日，这在中国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值得研究。

我这里只是零碎地写了点其芳同志的为人和我个人对他的一些朴素的看法。至于他在诗歌、散文和理论批评方面的成就，国内早就有人研究，国际上也颇注意，还是让专家们来进行合乎实际的科学评价吧！我只希望我这篇题记能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

缅怀其人 珍视其诗文

方 敬

好长的路！
好曲折的路！
多少人倒下了
而又多少人继续走下来的路！
终于走成了一条异常广阔的路！

新中国呵，
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呵，
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
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

诗人何其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就充满希望和激情唱出了他对新中国的梦想。好久好久了，他想作一曲《毛泽东之歌》，热情歌颂伟大的领袖，歌颂他的路线——总是胜利的路线。是的，在毛主席卓越的领导下，“向

我们的胜利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仅仅过了三年，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解放了！其芳放声高唱“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同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终于走在异常广阔的大道上。其芳，一个无产阶级战士，一个诗人，一个文艺理论家，在这广阔的路上，以文艺为武器继续战斗前进，要把新中国的基础筑得很坚固，再走呵，走向更美满的黄金世界……

但是，在继续阔步前进的征途上，还有着狼。狼还在横行。狼又可以变狐狸。万恶的“四人帮”，出自他们反革命的狼子野心，妄想阻挡历史滚滚向前的车轮，使光明的新中国倒退为黑暗的旧中国。因而他们残酷地打击迫害在广阔的路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其芳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园地里热情满怀的忠实的歌手和辛勤的园丁，一个富有战斗力的勇迈的文艺战士。长期以来，他的身心备受“四人帮”的摧残，受尽各种折磨和煎熬，他的名字横遭“四人帮”的鞭打，他被禁止歌唱，黑手想把他埋葬。他是多么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热爱和捍卫他先是多年盼望而后来已经实现了的多年的梦想——新中国呵！在新中国岂能容那一帮魔鬼用他们最黑最黑的影子遮蔽照耀天地的红日，遮蔽我们党的无穷无尽的光辉！其芳对“四人帮”轻蔑地冷笑，投以鄙夷的目光。一声惊雷，华国锋同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其芳和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一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又一次获得了解放。他

狂热地庆祝这第二个最伟大的节日，象第一次得到解放那样欢呼呵！歌唱呵！跳舞呵！到长安街上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来，到多么灿烂的阳光下来！他不顾年老病弱，拄着手杖，快步加小跑，参加了两天庆祝大游行。

其芳热情洋溢，意气风发，才思纵横，象涌泉似地倾吐出三十年前期许的《毛泽东之歌》，敬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以动人的衷忱，歌颂敬爱的周总理，“他在我们的心里象高山崔巍”，赞唱又有了新的领袖华国锋同志，无比英明，无比果敢。

其芳怒火冲天，义愤填膺，斗志昂扬，以歌声鞭笞痛击“四人帮”。《我控诉》，多么慷慨激昂，淋漓痛快：“这一帮叛徒、内奸、工贼！这一窝害人虫、变色龙、毒蛇！”

“他们是狼狗、疯狗，可怕的兽嘴张开象墓穴，刀剑似的牙齿滴着人血……”“对‘四人帮’的余威和余毒，决不能手软，决不可轻视。要打落水狗，要鞭尸，死尸的臭气也不容易消除。”

在光明战胜黑暗的不平凡的日子里，其芳从他生命的烈火中唱出了炽热的战歌、颂歌和凯歌，这是他四十年革命战斗生活中最强的歌声，全国胜利的大交响乐中响亮的乐音。他永葆革命的青春，老年的血管里流着青春的血液。他生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用全生命唱出了热爱的和憎恨的歌，越唱越嘹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欢唱着人民胜利的春天。

其芳自己说过，最初引诱他走上写作之路的是诗歌，而他诗歌的道路是长长的艰苦的道路。他早年的诗象一条小河流错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柔柔的弱水在迷离的梦幻中流。然而不久竟遇上一个巨大的转折，他的诗一变而成现实世界上的江河，逐渐掀起了洪波，流呀流，流过他的一生。

很早，诗歌就迷住了其芳幼小的心灵。在他幼年吟诵古诗已成为他的爱好。他富有诗的敏感和想象。在初中上学期间他就对新诗一见倾心，而且开始新诗习作。这就是他诗歌创作的前奏。他进入创作时期，含辛茹苦，呕心沥血，写了不少的新诗。经过他自己以严肃的态度和严格的尺度精选，只编成了两本诗集：《预言》和《夜歌和白天的歌》。两本诗集当然不算多，但是它们一版再版，多次重印，在诗坛和读者群众中产生了影响，得到很好的反映，许多人，特别是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其芳的诗；还有不少醉心的偏爱者。他已成为读者欢迎的著名的优秀的抒情诗人。

由于思想和感情的变化，《预言》与《夜歌和白天的歌》反映出诗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境界，而这是从《夜歌和白天的歌》里第一首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分界的。

《预言》，诗人早已把它当作只是个人过去的陈迹和思想发展的旧痕看待的。在他早年，旧社会的具体环境和教育，狭小的生活圈子，以及他对尘世的丑恶和庸俗的厌弃，使他避开现实，脱离政治，而迷恋艺术，为个人而抒写。并且